

书写中华文化自信 把握中国学术自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双一流”建设文化传承创新的实践与探索

高利红 刘伟*

摘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国家“双一流”建设中，积极推进文化传承创新，探索挖掘校史，打造校园文化地图；厘清学脉，编纂学科学术发展史；整理学术资源，汇编先贤文集；整合学科优势，创建中南历史研究院等四大方面的实践经验，传承红色基因，阐释新时代中国经济、法治成就根源与自信底蕴，把握学术自主，落实“双一流”建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关键词：文化自信 学术自由 “双一流”建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历史和全局高度，把文化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把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教育乃国家与民族文化命脉之所系”^[2]。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将“传承创新优秀文化”作为“双一流”建设的五大任务之一，提出“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做到

* 高利红，女，河南商城人，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刘伟，女，湖北天门人，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助理研究员。

扬弃继承、转化创新,并充分发挥其教化育人作用,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扎根中国大地,创造性地传承、创新性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之路的根基。

1948年,在挺进中原、解放全中国的烽火硝烟中,邓小平和陈毅等革命元勋创办了我校前身中原大学。70余载筚路蓝缕、薪火传承,作为一所有着鲜明红色基因的财经政法高校,我校以强烈的文化传承使命感挖掘、理解、归纳、阐释本校、本区域、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书写文化自信,把握学术自主,落实“双一流”建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一 挖掘校史,打造校园文化地图

学校南湖校区占地2800余亩,通过对校园文化资源的全面挖掘、盘点和梳理,形成一套特有的有关地名命名的文化“密码”。道路分为三级,分别为大道、路、街。主干道分为东西纵向两条“大道”和南北横向八条“路”:东西方向有中原大道、中南大道,中原大道命名源于我校的前身中原大学,中南大道是我校的简称“中南大”;南北方向有博文路、明理路、厚德路、济世路、修身路、齐家路、治国路、天下路。连接“道”与“路”的是街,分别被命名为格物街、致知街、正心街、诚意街。命名分别来自儒家四书中《大学》的“三纲八目”——三纲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目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各街道区隔出的空间分别被命名为希贤岭、明昭园、仲弘园、梓年园、翔宇园,这些命名分别纪念我校的建校先贤邓小平(字希贤)、刘伯承(字明昭)、陈毅(字仲弘)、潘梓年以及在1967年亲自莅临我校指导的周恩来总理(字翔宇)。而居于其间的教学楼则依据我校第一任校长范文澜先生的名字而被命名为一系列“文”字头名字。这一套命名体系融合了学校的革命历史和对中国优秀教育传统与思想的理解,体现了我校人文社科类大学的定位。我们走在中南大的校园里,就是走在这样一套文化地图里,走在我校70年的历史脉络中。

二 厘清学脉,编纂学科学术发展史^[3]

学科是大学构成的核心要素,学科学术的发展历史,是大学发展的根基所系。我校财经政法融通发展的学科特色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工商管理学源自1949年12月成立的中原大学财经学院工厂管理系,应用经济学初始于1950年创办的中原大学财经学院金融系、贸易系,法学肇端于1952年9月成立的中原大学政法学院。观衰见盛,居安惕危,述往思来,审视学校学科学术发展的历史,厘清学科自身的历史谱系,是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的一项紧迫工作。

在我校建校70周年、“双一流”建设攻坚之际,学校启动学科学术史的编纂,

在历史视野的观照下，从本国、本地、本校的独特经验出发，挖掘我校 70 年学科学术研究谱系和方法论传统，以建构学科学术特色气派和自主话语体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科学术发展史（1948～2018）》以学科为基本单元，从学科、学术、学人、学事的视角，系统梳理 1948 年建校以来学科学术发展的整体脉络，总结学科学术建设经验，展示学校历史底蕴，传承学术精神，勾勒学科学术未来发展方向，以启“双一流”建设之鸿猷。全书分上、下两卷，包括史纲、学科分史、学者名录、大事记四部分，时间跨度 70 年，参与编纂人员数百人，成书 240 万余字，可谓鸿篇巨制。

三 整理学术资源，汇编先贤文集^[4]

70 年来，学校积淀了丰厚的学术资源与精神传统。为铭记先贤功业，传承学脉，嘉惠后学，献礼校庆，学校启动“先贤文集”工程，对我校各个历史时期先贤的学术论著进行收集、整理，结集出版。

首期出版专著七册、论文集萃两册。专著包括范文澜、潘梓年、马哲民、胡善恒、杨时展、刘叔鹤、江任天、曾宪信、朱继良等诸先贤的代表作，在文史、哲社、财经和政法领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论文集萃收录了 70 位先贤的学术论文，分别汇编为财经卷和政法卷。

逝去的先贤代表了巨变时代学校学术共同体的三个群体：以范文澜和潘梓年两位老校长为代表的革命先贤，坚守马克思主义革命传统和学术传统，奠定了我校新型人民大学的鲜亮革命底色；以胡善恒、曾昭琼为代表的海归先贤^①，他们接受过系统的西学教育，学养深厚，夯实和树立了我校财经、政法类学科的专业基础和学术品格，推动我校从革命大学向专业化、现代化转型；以蒋碧昆、张寄涛为代表的本土先贤，为学科的恢复和发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奠定了“中南学派”的学术根基。先贤们的学术成果，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中南大的学术脉络和深厚底蕴，他们所积淀的鲜明的学术风范、学术品格和精神传统，内化成中南大的学术文化基因，是学校永续发展的精神力量之源。

四 整合学科优势，创建中南历史研究院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知识体系的渗入，中国传统知识系统逐渐衰落，转型为“文理法商医农工”的“分科治学”。随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彼此分离、相互割裂，“不断强化的‘分科治学’体制导致学科划分日益细碎，各科均按自身逻辑和取向推演发展，与其他学科互相隔离甚至彼此排斥，理论方法自成统系，知识技能不断专化，逐渐陷入‘闭锁’（Lock-in）和‘内卷’（Involution）状态”^[5]，“渐成割据分封，画地为牢，而占山为王与落草为寇实无二致”^[6]。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逐步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位制度，建立起以 13 门类

划分的现代学科体系。然而, 长久以来, 依附于“西方中心论”的知识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西方理论的‘资料员’和‘研究助手’, 对于西方理论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 从而导致有关中国发展的主体性知识的供给不足”^[7]。“中国当代的学科划分大体秉持了自然科学求精求细的精神, 人文学科内部也呈不断分化之势……贯穿中国学统的文史哲交融在现代学科体系下已然分崩离析”^[8]。中华文明 5000 年的历史、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 170 余年的历史、五四运动以来 100 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的历史、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史, 在世界历史学术版图中难觅踪影, 缺乏主体的建构与学术话语权。“任何一个问题, 都不能借用已经全面结构化的西方社会所形成的学科体系来处理”^[9]。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 多次指出历史研究在我们当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 “要把我国历史文化和国情教育摆在青少年教育的突出位置”;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要进一步繁荣发展, 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就需要把历史研究作为理论起点, 深刻揭示中华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规律, 从而进一步夯实国家治理、民族复兴的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更加重视历史的镜鉴作用,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 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 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与人类历史的整体性相适应, 史学具有综合、跨学科的性质。清末京师大学堂史学教习陈黻宸所编《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就史学与科学(学科)的关系论述道: “读史而兼及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舆地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 史家之分法也; 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 史家之总法也……史学者又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10] 作为一所传承红色基因的人文社科类大学, 我校的首任校长即为史学大家范文澜教授。学校一贯重视法学与经济学的历史研究, 专业史学科积淀深厚。秉持家国情怀, 发挥跨学科优势, 经过几代学人“板凳甘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范文澜)的开拓积累、沉潜蓄势, 法律史、经济思想史、经济史、会计史等学科学术特色鲜明, 名师云集, 成绩斐然。法律史学科是我校最早的三个法学博士点之一, 也是全国法学最早的二级博士点之一(2003年)。经济思想史学科是全国较早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研究生(1982年)和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点之一(1983年), 被誉为全国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三大中心之一, 学科带头人邹进文教授现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经济史学科创建于1953年, 是我校的传统优势学科, 赵德馨教授在全国首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 在全国高校的同类研究领域处于最前列。会计史学科在以郭道扬教授为旗手的团队努力下, 经过近40年的发展, 已经成为会计史研究的高地, 对扩大中国会计在世界的影响做出了巨大贡献。

因应新时代文化传承创新和历史研究的重大使命，学校整合法律史、经济思想史、经济史、会计史等学科的研究力量，创建中南历史研究院这一跨学科综合性学术机构，通过学科交叉、资源互补，回归博综天人的中国史学传统，推动“法与经济学科群”融合发展、范式更新，反思欧美殖民扩张进程中产生的西方话语体系，阐释新时代中国经济、法治成就根源与自信底蕴，为人文社科大学发展固根铸魂。

（一）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

中南历史研究院将学术研究的组织和开展放在首位。“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苏东坡），为前贤继绝学，为后世指方向，以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南大特色的财经政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己任。通过对中华法律文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会计通史等重大项目的研究，以史经世，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亟须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党和国家提供历史镜鉴和理论支持。助力区域发展，挖掘、重构长江流域生态文明、经济贸易、法律制度、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过程，服务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打造高端智库。

郭道扬教授最新成就，历时8年、独著的5卷本300万字《中国会计通史》，全面深描中国远古、先秦、中世、近现代会计发展的历史轨迹，首次系统展示中华会计文化独特的自创贡献，并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的会计改革史，推进新时代会计研究，开创并奠定新中国会计史的研究格局和领先地位，将由人民出版社分中、英文出版发行。赵德馨教授编撰的《跟随历史前进——赵德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回溯他为中国经济发展学做出的奠基性贡献。邹进文教授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以留学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首次系统收集、整理国外大学散存的近代留学生档案资料，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实现了研究方法论上的突破，已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陈景良教授在宋代法制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在古典判牍叙事中发掘传统司法理性，为探索编纂“民族性”的中国民法典提供了借鉴路径。^[11-13]齐文远教授主编的《中国监察文化简史》，勾勒中国监察文化的历史变迁，发掘古代监察文化的璀璨瑰宝，书写中华监察文化的华彩篇章，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监察体系提供了参考。环境法学科致力于中国特色环境史学研究，系统总结传统中国“顺天应时”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流域生态治理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为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提供了思想资鉴。^[14]

（二）立德树人

我国近代的大学制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学科发展，人才培养，重知识积累，重科学研究方法和学科范式，取代了传统社会以道德为先、以修身养性为主的古典理想教育，开始融入西方学科与话语体系。但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东西方文化内在矛盾仍难以化解，道德、法律、市场逻辑依然存在割裂，近代以来整个民族持续经历着某种分裂的焦虑。“特别是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我们在接受西方现代科学的同时，基本上直接接受了西方文化中‘人’和‘自然’的二分的、对立的观念，而在很大程度上轻易放弃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价值观”^[15]，“导致工具主义和物质主义日

益盛行,心不御物,德不配能”^[5]。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深入学习西方文明,逐渐融入全球化体系,实现了物质的极大积累和学术学科的显著跃进。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是在此前百年民族奋斗基础上的深化改革,时代要求我们开始积极主动参与新型国际秩序建构,更新学科话语体系。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规定“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6]。

中南历史研究院秉持专业素养与人文素养并重、历史与现实融通的原则,通过学科交叉汇聚,突破传统单一学科培养方式,打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新范式,培养德行与能力健全均衡的复合型人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目前已经推出“传统社会中的法律生活”“中国会计文明史”等“读懂中国”课程。从跨学科角度,体现不同领域知识交叉综合探究,培养学生具有多学科思维和综合分析问题的方法与能力;从主体性角度,培养学生深刻理解中国文明的包容性、统一性、复杂性及其生生不息的合理性;从多元性角度,坚持文化多元论,阐释与其他类型文化多元共存格局中的中华文化,加深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构建的新人类生态体系;从反思性立场,通过反思性历史知识培养具有反思性认同的个人,在人类生态框架下,反思当代欧美史家建立的典范世界文明史主轴,以批判思维了解与体谅历史和现实;从国际化角度,通过开设国际化课程、聘请外国专家进行中长期授课、为学生搭建出国交流学习平台,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能引领未来的拔尖人才。

(三) 系列文博馆建设

加强货币金融历史博物馆、会计史文博馆建设,筹建法治博物馆,使之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学术交流和教学实践的综合平台,全方位展示中国经济法治文明,彰显我校学科特色、学术积淀。

中国货币金融历史博物馆已建成面积为 660 平方米、7 个独具特色的展厅,近三年来接待观众 5 万余人。中国会计史文博馆目前已收藏文献古籍图书 10 余万册、会计及经济相关记录等文献资料 2 万余册,是中国乃至世界最重要的会计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的收藏场所。监察文化和法治陈列室是法治文博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示中国传统监察文化、中共监察制度下反腐败和反渎职的成果,成为学校乃至中南地区廉政文化的学习教育基地。

(四) 交流与互鉴

通过学术高端论坛、人员交流互访、学生联合培养、优秀成果外译等方式,讲好中国历史,传播中国文化,推进“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在罗马设立中国法图书馆,使中国法成为意大利律师高培班课程。在我校共建“中意学院”,举办“欧洲学:比较法与欧洲法”硕士研究生项目,以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深研罗马法与欧洲法,输出中华法律文化,阐释书写当代

中国法治文明，推动法学发展重心版图向中国转移。

近年来，分别承办了“理论与实践：中西法律文化交流下的法律史研究”“传统与现代：比较法视野下的中西法典编撰”“法学家与法的形成：从罗马法到中国的法典编纂”等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推进中意文化交流互鉴方面卓有成效。以《中国会计通史》一书为契机，经教育部批准，我校拟于2024年召开国际会计史学家协会第十六届会计史研讨会。

加强专业史与外语学科的协同合作，开展优秀成果外译项目，推动学术成果国际化，并反思19世纪以来语言和翻译所建构的现代性，重构中国历史的书写范式，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

结 语

新时代“双一流”战略具有在国际学术竞争中谋学术自主、谋一骑绝尘之文化自信的内涵。我校将勇担历史使命，以文化传承创新为基石，潜心梳理本土资源，弘扬传承历史文化，创新学科学术自主，助力重大战略发展，培养民族复兴新人。

注释

- ① 1952~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中，以中原大学财经学院为主体，合并中山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河南大学、广西大学、武汉大学、中华大学等的财经学科组建中南财经学院。以中原大学政法学院为主体，合并湖南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大学的政治系和法律系组建中南政法学院。师资队伍中拥有海外经历的有50多人，是我校历史上最早的海归教授群体。参见《“文革”以前我校的海归教授》(<http://archive.zuel.edu.cn/2018/0425/c637a189965/page.htm>)。

参考文献

- [1]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 [2] 刘小枫、甘阳：《大学改革与通识教育》，《开放时代》2005年第1期，第4~44页。
- [3] 栾永玉、杨灿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科学术发展史（1948~2018）》，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序言。
- [4] 邹进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典文库·先贤文集系列》，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总序。
- [5] 王利华：《历史学家为何关心生态问题——关于中国特色环境史学理论的思考》，《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96~106页。
- [6] 桑兵：《盲人摸象与成竹在胸：分科治学下学术的细碎化与整体性》，《文史哲》2008年第1期，第23~29页。
- [7] 李小龙：《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自主与文化自觉》，《文化纵横》2018年第5期，第42~44页。
- [8] 侯深：《穿越河堤的小径》，《中华读书报》2016年12月14日，第13版。

- [9] 刘小枫、苏国勋等:《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开放时代》2006 年第 1 期,第 4~53 页。
- [10] 桑兵:《教学需求与学风转变——近代大学史学教育的社会科学化》,《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 4 期,第 169~180、207 页。
- [11] 陈景良:《何种之私:宋代法律及司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 年第 3 期,第 139~154 页。
- [12] 陈景良:《突出“民族性”是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当务之急》,《法商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134~142 页。
- [13] 陈景良:《寻求中国人“过日子”的逻辑》,《人民日报》2016 年 10 月 20 日,第 5 版。
- [14] 高利红、李培培:《中国古代流域生态治理法律制度及其现代启示》,《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第 52~59 页。
- [15]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3 期,第 5~16 页。
- [16] 习近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9/10/c_1123408400.htm, 2018 年 9 月 10 日。

Seizing Academic Autonomy to Build Cultural Confidenc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ZUEL's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Gao Lihong Liu Wei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has proactively promoted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ZUEL is committed to exploring the university history, creating the map of campus culture. It is devoted to compil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discipline and academic, collating academic resource and compiling corpus of the late sage. It also attaches much importance to integrating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four aspects, such as discipline superiority and building Zhongnan Historical Institute. Inheriting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it has explained the achievement and confidence of China's economy and rule of law in the new era. ZUEL takes positive steps to seize academic autonomy, so as to fulfill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which is to foster character and civic virtue.

Keywords: Cultural Confidence; Academic Autonomy;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